

《民众的大联合》是青年毛泽东 世界观急剧转变的标志

冰 峰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创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载入史册,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这年7月,毛泽东等先进青年,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同志任主编,并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战斗檄文,用新的思想激励人们,向压迫者作拼死的斗争。《民众的大联合》(以下简称《联合》)(一)、(二)、(三),就是其中一组重要的文章,成为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代表作。史学界对该组文章曾发表过不少评述,论证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地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给予了崇高的评价。然而,过去绝大多数文章,都把《联合》当作一篇文章看待,因而,在评价它的重要性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局限性。以笔者之见,《联合》是一组三篇文章,而非一篇长文。从《联合》(一)到《联合》(二),再到《联合》(三),清楚地表明作者思想的急剧发展变化过程。下面谈谈我的愚见,愿识者指教。

一、《联合》是三篇文章而不是一篇长文,其根据是:

第一,《联合》于1919年7月21日、28日和8月4日,先后发表在《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上。虽然文章的大标题相同,但(二)、(三)两篇都各有一个副标题即:以小联合作基础;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联合》(二)、(三),署名都是泽东。

从文章的正副标题和作者署名的排列看,它严格地规定了每篇文章的中心和范围,使其各自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结构。《联合》(二)开宗明义地讲:“上一回的本报,已经说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联合》(三)开头也说:“上两回的本报,已说完了(一)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吗?有此动机吗?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这就概括地说明了三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各自的内容。如果是一篇文章,这种写法是不可思议的。作者在《联合》(三)中列举了当时已经组织起来的许多团体后说:“上列各种,都很单纯,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小联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连用了三个“本报”,而不用“本文”这么一个非常明确的词,就更加说明《联合》是三篇文章,而不是一篇文章。

第二,从文章的结构看,每篇文章的结构都是十分严谨的,各有其开头、主体和结尾。《联合》(一)和《联合》(二)的结尾均未注明“未完”或“待续”等字样,而是讲完了这一回,才开始下一回的试述。这也说明作者不是把它作为一篇长文连续刊载,而是作为三篇文章分别发表。有的同志说《联合》是一篇文章,“连续分三次发表”^①。我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如果说文章当初发表时,因条件所限分三次刊登,那么在后来收录时就应以一文收录,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版本,几乎都是作为三文分别收录的。因此,上述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正因

为这样,肖三同志曾毫不含糊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详细论述了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②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

仔细推敲三篇文章,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同和区别:《联合》(一)着重说明联合起来的迫切性;《联合》(二)具体指明了实现联合的方法和步骤。上述两文,对实现大联合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述,但《联合》(三)对它的可能性又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证。显然,这一次的论证,是上两文的升华。所以,《联合》(三)的重要性与前两文是不可比拟的。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联合》(一)、(二)、(三),是一组文章的有机结合。三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众的大联合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解决了当时革命者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向统治者作斗争的根本方法问题,这是文章对革命的最大贡献。所以文章一发表,受到全国各地革命者普遍的关注,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那么过去的一文之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追根求源,“账”,还应该算在胡适的头上。早在1919年8月24日,胡适就对《联合》作了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③也许由于胡适这个当时所谓的权威所下的结论的缘故吧,“一文”之说就沿袭下来了。后来也有人认为是三篇文章,但没有展开论证。因此,“一文”与“三文”之分的重要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分清《联合》是一篇文章还是三篇文章有何意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从史学界对《联合》的评论中所存在的分歧说起。

当前,史学界对《联合》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认为《联合》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不能算马克思主义作品;

第二,认为《联合》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毛泽东的代表作;

第三,说《联合》中既有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又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不能作为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代表作。

上述三种看法,各有其根据,而且根据大多引自文章的本身。然而,所得结论,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本来是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三篇文章当作一篇看待,因而在评价时,只看到它的连续性,而忽视了它的独立性。这样,《联合》(一)中的观点,《联合》(二)、(三)也必然有份,因为评论家把它们看作是一篇文章嘛!例如《联合》(一)中写到:“俄国的克鲁泡特金比马克思这一派要温和,他们的主张更广、更深远”。如果仅从这一点看,很自然地得出《联合》有无政府主义观点,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但从《联合》(三)来看,它又确实富有革命的战斗性,文章在末尾说:“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势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从这一段话看,说它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也并非言过其实;要是纵观《联合》(一)、(二)、(三)全文,也不难得出,它既有无政府主义观点,又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也有理由认为它不是一篇成熟的作品,不能代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转变。争论即起,不得定夺。

依我之浅见,《联合》是一组论述文。作者集中力量对人民大众需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重要性进行了一论、再论和三论。每论述一次,都有其新的见解。它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变化发展的一个侧面。而每篇文章就是这一侧面中的一小段。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作者在撰写该组文章前的思想简况:

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同志就忧国忧民，追求革命真理。1918年6月，他结束了学生时代的峥嵘岁月，开始踏入社会。此时的毛泽东，风华正茂，精力充沛，革命意志盛旺，但思想尚无定见。他曾给一位同学写信说：“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因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国家前途的暗淡，个人出路的渺茫，这是当时的毕业生普遍碰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青年们对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无不痛恨，对劳动群众的痛苦给予极大同情。这一思想正与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由于不满当时的社会制度而推行的“新村主义”相吻合。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新村主义”是救中华的良医妙方。于是结伴而行，遍走岳麓山，想寻找一块宝地，搞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的“新村试验”。显而易见，这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信任唯心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没过多久，毛泽东接到他中学时期最信任的一位老师杨昌济教授的信，得知北京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在摸索中的毛泽东，喜出望外，为之一振。他决定到北京去参加与推动这一运动。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经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他在北大图书馆日报阅览室工作。由于工作条件之便，他认识了不少学者名流。好学不倦的毛泽东，主动向他们请教，得到许多教益。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蔡元培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④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北大各种思想十分活跃，各种社团纷纷成立。既有以李大钊为首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新思想，也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各种流派。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同时，对各种主义和思潮也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又不盲从。他主张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对真理和谬误都要进行检验，以求得正确的答案。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⑤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颇受其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⑥这时的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但认识仍无定局，他正在寻找出路。正因为这样，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段的思想变化称之为“革命的前奏”^⑦，是颇有道理的。

毛泽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于1919年5月，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在湖南长沙成立学生联合会，提出“斩曹（汝霖）、陆（宗輿），以谢天下”，举行了焚烧日货的游行示威，进而创办《湘江评论》，撰写了《联合》的三篇文章。《联合》（一）主要是论述民众的大联合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从而唤起人民的觉悟，以求得自身的解放。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激进青年，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能认识到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可靠力量，这在当时说来，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认识上的这个突破，对青年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当然，文章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无政府主义观点，这也是事实。过去，有人在论述《联合》时，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其实，《联合》（一）中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比起《〈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要淡薄得多了。创刊宣言在讲到如何打倒敌人的方法时，说有二种，“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因此，文章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

‘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而《联合》(一)中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不仅没有这么明显，而且篇幅也大大减少了。文章除对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而言，其实，克鲁泡特金主张在实现其主义时也采取“激烈手段”^⑧)。明确表示赞同外，说他们还主张“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共臻盛世。但文章也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此国家和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反抗，有了民众的大联合。文章顺笔而下，列举了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资本家的大联合相对抗，收到了“社会改革”的胜利。随之而起的有匈、奥、捷、德等国，并预言胜利是可以“想得到的”。这就把十月革命与《联合》联系起来了，并以十月革命为榜样，鼓励人们去斗争，这是作者在认识上提高的表现。

《联合》(一)中虽然也提到了“呼唤运动”，但这里说的是平民群众的子弟被迫拉去当兵，当强权者指令他们去枪杀其父母兄弟时，他们的父母兄弟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使得他们“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鹭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可见，这里的“呼唤运动”已经有了一层新的意思。作者把“呼唤运动”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说明他对十月革命还了解得不甚深刻，但也说明这里的呼唤运动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了。因此，《联合》(一)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观点，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创刊宣言”相比，后者已开始取代前者，并将占据其统治地位。

《联合》(二)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以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为基础，进而组织起大联合。文章列举了农夫、工人、学生、小学教师、妇女、警察等各阶层人员所受的痛苦，认为他们的利益有共同之点，所以可以“立为大联合”。在讲到学生的要求时，说“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⑨正用得着”。卢梭是用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去反对封建专制教育，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看，作者提出这一主张也是很自然的。但文章紧接着说：“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决定取舍。该文只有一次提到“呼唤运动”，这就是当谈到巴黎和会日本帝国主义等国家要瓜分中国，段祺瑞军阀政府也准备接受丧权辱国的协定时说“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这实际就是指的刚刚爆发的五四运动。把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当作呼唤运动，自然是不大妥贴的，它说明非暴力运动在作者的思想中仍然占有一定的位置，但阵地已经不多了。与《联合》(一)相比，从公开称赞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到隐隐约约同意非暴力运动，认识上又有了前进。

怎样看待青年毛泽东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评论《联合》时不可回避的问题。那种认为凡是有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章，统统是不好的，这在无政府主义已经声名狼藉的今天，无疑是正确的。但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从固有的观念出发，简单地地下这样的结论。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主要原因是中国小资产阶级众多，有其广阔的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精神。在清朝反动统治者残暴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他们激发出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企图立即改变现状，所以很容易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⑩加之，无政府主义当时提出“各取所需”这个很动听又很迷惑人的口号，因此，“一般青年人相信的就多。”^⑪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未大力传播时，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的敌对态度。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深入人心时，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愈来愈大时，无政府主义就拍案而起，向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攻击。1919年9月，无政府主义头子黄凌霜在《新青

年》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批评》，就是这一攻击的开始。1920年9月，陈独秀、李达分别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尽管如此，但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原因，在我党创建初期，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没有完全被清除。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同志曾说过，因为无政府主义要推翻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一时还视它为“朋友”。然而他们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又不是我们的“同志”^⑫。甚至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两位使者到达广东时，在那里首先与他们往来的便是“无政府主义者”^⑬。后来一个时期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也“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把持”^⑭，只是由于他们坚持错误，终被党所清除。由此可见，作为一种信仰，无政府主义在一个时期之所以为人们所拥护，不外乎是两条：一是无政府主义曾在辛亥革命时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⑮，二是它当时的伪装还没有完全被剥去。我党早期一些著名活动家：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等，无不深受其影响。1919年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马克思的“阶级竞争”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上面提到的无政府主义头子黄凌霜写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就是刊登在由李大钊负责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陈独秀在《新青年》这个宣传新思潮的论坛上，“给了无政府主义以一席之地”^⑯，使他们得以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恽代英则直言不讳地说：“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⑰。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他的头脑中也不可能有先验的真理。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从不知到真知。如果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⑱，那不是事实。相反，在汹涌而来的新思潮中，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环境里，不受影响倒是奇怪的了。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但他并不是全盘继承；他高度评价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又不盲目崇拜。他曾说过：“吾意即西方思想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⑲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特别重视社会实践。任何外来的、再好的经验，总是别人的，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加以改造。正是有了这样的广泛兼收并蓄，才使他的思想有了迅速的转机。在毛泽东的帮助、带动和影响下，不少过去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的青年都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来了。湖南的黄爱、庞人铨^⑳就是一例，后来，他们二人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李大钊赞扬为“劳动阶级的先驱”。由此可见，三篇文章，《联合》（二）居于中间，是作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摒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开始；它是承上启下的过渡篇，没有这一过渡，就不可能有转变的开始。

《联合》（三）讲的是实现大联合的形势，实际上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对大联合的进一步论证，是三篇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文章概括地介绍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后，接着论述了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说“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下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作者在这里，不仅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而且要求付诸行动。和前两文相比，认识上大大不同了。因此，我认为三篇文章是青年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标志。其中《联合》（一）有无政府主义观点，表明作者的世界观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他正在各种主义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联合》（二）既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又有马克思主义，这时作者正处在十字路口上；《联合》（三）是由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三篇文章，犹如作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所踩的三个脚印，也好似上了三个台阶，一步比一步高，

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思想转变的一段过程。在此基础上，又经过许多次努力，他终于在“1920年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

如果把《联合》当作一篇文章看待，势必因文章中有无政府主义观点而加以贬低甚至否定。这就把作者在这一时期与日俱增的思想变化，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而忽视了发展、变化的一方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一文”与“三文”之分，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它的实质就是作者在写该组文章的过程中，认识是固定不变的？还是突飞猛进的？显然，“一文”之说，只能得出前面的结论，“三文”之说，很自然地得出后面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能清楚看出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脉络。

这样说来，是否把作者的思想在这一段的转变看得过分简单了呢？或者拔高了呢？笔者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这里所说的作者思想的转变，还是属于量变总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不是总的质变。这就是说，作者由民主主义者转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从总体和全局来说，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确又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了。从作者当时的世界观来说，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但就文章中所论述的人民群众联合起来是革命力量的源泉这一点来说，却完全符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又不能不说是部分的质变。而这种部分的质变是从量变过渡到根本质变的必要阶段，它无疑将促进总的量变并最后过渡到总的质变。

综上所述，《联合》（一）、（二）、（三）所论述的中心问题，就是毛泽东同志后来一再论证和强调的，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三大法宝之一——革命的统一战线。三篇文章为这一理论打下了基础。随着革命的发展，在我党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一理论日臻完善，成为我党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注释：

① 张国基：《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处的日子》，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9页。

② 肖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见《新民学会资料》第37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见《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④ 蔡元培口述传略。

⑤⑥⑦⑧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132、128、125、131页

⑧⑨⑩ 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见《“一大”前后》（二）。

⑨ 在教育观点上，卢梭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主张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见《辞海》第179页。

⑩⑪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二期

⑫ 《“一大”前后》（二）第417页。

⑬ 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曹仲彬：《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质疑》。

⑭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三版上册第20页。

⑮ 《恽代英日记》191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624页。

⑯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⑰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⑱ 黄爱、庞人铨，原系湖南“劳工会”领导人，无政府主义者，经毛泽东说服、教育和争取，于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英勇牺牲。